第五章　結論

影響一位文學家創作的因素很多，外在環境只是其中之一，而外在環境中的政治因素有時甚至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，對於一個宦海浮沉五十餘年，且涉入黨爭至深的文學家來說，政治因素絕對不容小覷。黨爭看似主宰了蘇轍的一生，然而，真正主宰蘇轍命運的，最終仍是他自己，因爲他在政治立場的抉擇上擁有絕對的自主權，他一生的仕途起伏便是他自由意志下的結果。

只是，蘇轍以自由意志選定了自己在黨爭中的位置，文學創作卻不由自主的深受黨爭影響——仕途境遇影響他「寫什麼」，黨爭情勢決定他「怎麼寫」。「寫什麼」關係著文學作品的內涵，「怎麼寫」隸屬於書寫形式的範疇，故本論文以「蘇轍與北宋黨爭」、「蘇轍文學的內涵與黨爭的互動」、「黨爭對蘇轍文學書寫形式的影響」爲主要章次，討論黨爭影響蘇轍文學創作的面向與深度，現將討論結果簡述於後：

一、熙寧黨爭對蘇轍文學創作的影響

蘇轍於仁宗嘉祐二年(1057)登進士第，嘉祐六年(1061)制舉入等，但因先後丁內、外艱之故，在仁宗、英宗兩朝實際擔任官職差遣的時間僅一年。蘇轍真正長時間、連續性的任官，始於神宗熙寧二年(1069)，而這一年也正是王安石主持變法的開始。王安石推行新政首重理財，蘇轍詳論國家財政問題的〈上皇帝書〉，在大原則上正與之不謀而合，緣此，神宗特旨除授，命蘇轍於變法機構擔任「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」。蘇轍身爲變法機構的要員，議事卻每與王安石多有齟齬，在政治理念歧異過大的情形下，他主動求去，請補外任。熙寧三年(1070)至元豐二年(1079)烏臺詩案發生以前，蘇轍選擇接受與其政治理念相近官員的徵辟，擔任州郡幕職官。其他對新法懷有歧見的官員，既知王安石得神宗支持，其鋒芒不可直攖，也紛紛請補外任。看待熙寧新法的正、反態度，遂逐漸演變爲新、舊黨爭。就結黨意識而言，新黨因支持新法的目標一致，故爲有意識的結合，舊黨則因反對新法而被籠統歸爲一黨，舊黨的共通性既在反對新法，而非相同的政治理念，是以舊黨雖稱「黨」，其實並無結黨意識。蘇轍否

定新法的政治立場十分鮮明，行動也與反對新法的官員一致，自然被劃歸舊黨。熙寧三年(1070)至元豐二年(1079)烏臺詩案發生以前，滿懷理想的蘇轍選擇屈就於官卑俸微的州郡幕職官，這是他自我堅持的結果。

將近十年屈居幕職官的仕宦生涯，雖然出於蘇轍的自由意志，畢竟對他從政的理想造成一定程度的挫傷，現實的壓抑積累成內心的鬱結，經由文學創作得到宣洩昇華。熙寧時期，蘇轍因外在環境造成的內心鬱結，反應在文學作品的創作主題上，一是對於新法時政的批判，二是對於仕途的重新省思。蘇轍評議新法時政，既是申明他在政治立場上的一貫主張，同時也傳承了士大夫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；省思仕途則是理想與現實碰撞後的結果，因仕途顛躓而萌生進退出處之思，幾乎是每個士大夫的共同反應，蘇轍初次受挫，當然也沒有跳脫這個格局。

再就書寫形式來看，蘇轍藉以評議時政的文體包括論時事狀、詩歌、記敘文三種，它們在表現功能方面的共同特徵是直言不諱，在書寫技巧上則各具特色：論時事狀爲上行公文，據理詳論是基本要求，寓刺於美是蘇轍刻意經營的書寫手法，因爲他在評議時政之際，必須同時兼顧君臣間的尊卑關係。詩歌沒有閱讀對象方面的顧忌，故無論採用譬喻修辭格或平鋪直述法，諷刺的效果都十分顯著，尤其是譬喻修辭格，「喻依」的部份最能表現出諷刺的深度。此外，譬喻修辭格不僅運用在詩句的經營上，也有將全篇詩歌以「借喻」方式呈現的作品，這是一種借題發揮的寫作形式，而這類作品之所以能確認其爲譏刺時政之作，全賴蘇轍在詩中留下明確的線索。藉由記敘文評議時政，同樣是借題發揮的結果，蘇轍往往自原先設定的題目中，刻意引申出批評新法時政的論點，作爲文章的主要內容，達到他借題發揮以暢所欲言的目的。至於仕途省思這個主題，絕大部分皆以詩歌作爲表達形式，書寫上的特點也以直言抒懷、借題發揮爲主，但變化不及評議時政這個主題的作品豐富。兩個主題在書寫形式上之所以小有差異，一則因評議時政本具諍諫的意圖，形式的經營關涉意圖達成與否，故而顯得格外重要；二則因仕途省思屬於內在的自我反省，書寫的目的既在單純的抒發內心感受，形式上的雕琢便顯得有礙且多餘，是以蘇轍不刻意經營。

二、元豐黨爭對蘇轍文學創作的影響

元豐二年(1079)七月，新黨爲箝制異論，由御史奏成烏臺詩案，指控蘇軾以詩歌謗讟新法時政。年底結案，蘇軾謫爲黃州團練副使，蘇轍坐罪筠州鹽酒稅監，直到元豐七年(1084)九月，蘇轍始結束貶謫歲月，改任歙州績溪令。烏臺詩案標誌著黨爭的質變，新黨在王安石罷相退居金陵以後，採取了強烈的手段敉平反對意見，從此，新舊黨爭由原本單純的政策之爭，漸漸流於相互傾軋的意氣之爭。

烏臺詩案對於蘇轍在文學創作內涵上的影響，首先是詩文中不再出現直言評議時政的內容，這顯示新黨奏成烏臺詩案，的確收到了箝制言論的效果。其次，獲罪處窮的憂患感，濃重的瀰漫在事件初期的詩文中，然而隨著謫居筠州日久，曠達的思維逐漸取代了逐臣的憂患，於是憂患與曠達之間的消長，在蘇轍筠州時期的詩文裡，形成了一條以曠達思想驅逐窮愁心情的發展脈絡。

在書寫形式方面，烏臺詩案造成的第一項影響是「消失」，最明顯的就是專門評議時政的論時事狀，自案發以至終元豐之世，蘇轍再不曾寫作此類文章。另一種較不易察覺的消失，發生在詩歌的部份。熙寧時期，蘇轍的詩作裡出現了借題發揮批評時政的作品，這些作品以「借喻」的方式寫成，雖然只呈現出「喻依」的部份，但蘇轍必定會在其中點出明確的線索，以框定未寫出之「喻體」的想像空間。烏臺詩案後，蘇轍仍創作這類借題發揮的詩歌，只是具有框定「喻體」作用的線索就此消失，以免政敵再度尋釁於文字之間。第二項形式方面的改變是「轉移」。蘇轍在謫居筠州期間著手修撰《古史》，將政治批評的形式由文學創作轉移爲史書修撰，藉由寓深意於史傳、史評的方式，爲內心的不平之鳴找到一個安全的發聲出口。第三項書寫形式上的特點是「委婉曲折」。這是一種迂迴而又有所保留的表達方式，蘇轍以委婉曲折的書寫筆法取代熙寧時期的直言不諱，不著痕跡的達成批評時政的目的。

三、元祐黨爭對蘇轍文學創作的影響

主導新法的神宗逝於元豐八年(1085)三月，其後便由代表保守勢力的高太后主政，「元祐更化」於是揭幕，短短一年之內，新法盡廢，新黨在朝、舊黨在

野的情勢也瞬間易位。被劃歸舊黨勢力的蘇轍，元豐八年(1085)八月在歙州績溪令任上，接獲秘書省校書郎的新授除命，元祐元年(1086)抵京之後，官職扶搖直上，歷任右司諫、起居郎、中書舍人、戶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翰林學士帶知制誥、吏部尚書、御史中丞、尚書右丞、門下侍郎。元祐時期是蘇轍仕途最平順的時期，卻也是與黨爭糾結最深的時期，無論是延續自熙寧的「新舊黨爭」，還是此時舊黨內訌的「蜀洛朔黨爭」，蘇轍或因擔任諫官、或因其兄蘇軾爲蜀黨領袖，始終難以自外於黨爭之中。

職責所在之故，蘇轍於元祐時期撰寫了大量彈劾新黨官員的論時事狀，並於呂大防等人主張進用新黨以調停黨爭時，再三上呈論時事狀，力陳君子、小人不可共處朝廷之理。論時事狀中的君子小人之辨將蘇轍推向黨爭的最前線，曾親見政局轉瞬變化的他，在政敵環伺的情形下，將內心隱憂寄託在詩歌之中，於是，抒發仕途隱憂、期望回歸故里這一類的內容，便成爲這個時期出現頻率極高的主題。論時事狀裡的君子小人之辨是站在國家的立場處理黨爭議題，詩歌中的前途隱憂純粹就個人立場抒發感懷，處理黨爭議題的態度越堅決，前途的變化就越堪慮，兩者間形成一股張力，使得蘇轍元祐時期的文學內涵更加豐富。

自熙寧以來，評議時政一直是蘇轍詩文裡不曾缺席的主題，熙寧時期毫無危機意識的直言批評，經歷烏臺詩案後轉趨委婉曲折，元祐時期雖然得以直言，莫測的未來仍令蘇轍有所顧忌。基於詩歌可能成爲政敵深文周納的材料，而論時事狀效果直接、沒有多餘的想像空間可被扭曲，蘇轍所有對時政的評議，遂全部採用論時事狀作爲書寫的形式。緣是之故，元祐時期的論時事狀至少高達一百六十八篇。除了論時事狀以外，另一個集中出現在元祐時期的書寫形式是題畫詩。蘇轍的題畫詩集中創作於元祐時期，與蘇軾同時在京任官有絕對的關係，因蘇軾爲當時的文壇盟主，且身兼書畫名家，他在元祐初期就任翰林學士、知制誥後，一個以蘇軾爲中心的文人團體便隱約成形，而該文人團體品題書畫一類的集會活動，便是促成蘇轍大量寫作題畫詩的重要因素。此外，這個以蘇軾爲首的文人團體同時兼具政治團體的色彩，他們既是文友，亦是政治上的盟友，題畫詩的寫作可視爲彼此間的唱和交流，交流文學藝術，也交流仕途感懷，是以蘇轍屢借題畫詩抒發隱憂、寄託退隱山林的渴望，書寫的篇幅往往超過對畫作主題的歌詠，題畫詩這個創作形式，在元祐時期因此有了異於其他時期的獨特意義。

四、紹聖黨爭、崇寧黨錮對蘇轍文學創作的影響

哲宗親政以後，政局又頓時翻轉，新黨重新掌權，元祐大臣紛紛被逐，蘇轍在這次權力更替的過程中，於紹聖元年(1094)以謗訕神宗的罪名出知汝州，旋即降知袁州，未幾再降試少府監，責令筠州居住。紹聖元年(1094)，蘇轍歲歷三黜，紹聖四年(1097)，朝廷將元祐大臣集體貶往嶺南，蘇轍亦在遷謫之列，首先被命雷州安置，復移循州安置，直到元符三年(1100)哲宗逝世，才結束謫居嶺南的生活，卜居於潁昌。蘇轍閑居潁昌的歲月雖不再參與朝政，黨錮的陰影卻始終籠罩著他的晚年生活，爲此，蘇轍放棄返回眉山的夙願，並直到辭世的前一個月，才向朝廷提出致仕的請求。他一生的仕途，遂自始與黨爭糾結至終。

歲歷三黜、遠謫嶺南對蘇轍文學創作的影響，一是創作數量銳減，二是詩文中原有的、志在當世的主體精神消失殆盡，取而代之的是獨善其身的思維。黨錮的衝擊，一則使他的作品裡瀰漫著思鄉情懷，二則使他刻意在詩歌之中表現消極心態，藉以鬆懈政敵的迫害。至於元豐時期發展成熟的曠達思維，也不曾間斷的出現在紹聖至政和時期的作品中。

當然，政治上的劣勢總爲蘇轍的創作帶來諸多限制，紹聖、元符時期，蘇轍不僅創作量銳減，也幾乎戒絕了以詩歌與他人酬唱的習慣，這種自我限制的情形，在元符末年以後漸漸解除。但論時事狀這個元祐時期大量寫作的文體，卻在出知汝州以後消失，再不復見。消失的創作形式等於關閉了情感的抒發出口，蘇轍需要另覓其他的管道，於是，他複製了元豐時期「轉移」的模式，接續未完成的《古史》，更撰寫了《龍川略志》、《龍川別志》、《歷代論》。然而，黨錮對蘇轍書寫形式最大的影響，是刺激他創作多達萬餘言的〈潁濱遺老傳〉。蘇轍面對當下的困境可以淡然處之，看待後世的毀譽卻不能無所動心，〈潁濱遺老傳〉便是蘇轍抵抗黨錮的利器，他不爭一時而爭萬世，〈潁濱遺老傳〉成全了他的願望。

蘇轍流傳至今的詩歌將近一千八百首，文章數量也在千篇以上，這些數量龐大的作品，並非件件可見黨爭的影響，但是黨爭的確在他的作品裡烙下了既深刻又清晰的痕跡。每一件文學創作都是文學家書寫自我的過程，在一一檢視

這些作品之後可以發現，蘇轍大部份的人生歲月被侷限在黨爭之內，但是他的生命格局，卻能逐步擺脫困境，最終超然於黨爭之外。蘇轍文學中的藝術感染力，很大一部份便是來自這份鮮被察覺的超然。